

中国改革一路如何走来？经济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危机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改革停滞困境如何突破？

# 什么改变 中国

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张维迎 | 著

著名经济学家

张维迎教授叩问中国经济改革之作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 什么改变中国

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张维迎一著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 张维迎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086-3352-7

I. 什… II. 张… III. 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研究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926 号

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SHENME GAIBIAN ZHONGGUO

---

著 者：张维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165千字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0月第4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352-7/F·2631

定 价：39.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 理念决定未来

自 1978 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 13 位上升到现在的第 2 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

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适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

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还应该指出，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 \* \*

本书的内容来自过去几年里多家媒体对我作的访谈，针对的背景就是以上所描述的两种理论思潮及改革停滞和倒退的现实。我之所以愿意结集出版这些访谈，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内容有助于澄清人们在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应该选择的改革方向。

大致来讲，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界，本书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访谈，主要是针对“改革失败论”的；金融危机之后的访谈，主要是针对“中国模式论”和现实政策的。

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2004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

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一开始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学术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对国有企业被迫民营化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对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观点。这个采访发表后，网络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我还就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太大，而非市场化改革本身，网络上的评论仍然是负面居多。2006年3月，我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希望将有关改革的争论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绪发泄。这篇文章可以说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也影响了一些人的观点。之后，我又接受了《权衡》杂志记者的采访，提出了“企业家改变中国”的观点。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重点分析了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利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机会，我除了撰写学术文章，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深度采访，并在凤凰大讲坛演讲，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



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当美国国会就7 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4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经全国人大讨论的情况下已经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这更证明了中国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由此，在改革30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在此背景下，从2009年初开始，我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并相继接受新浪财经、网易财经等媒体的深度访谈，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刺激政策和体制倒退提出批评。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主要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灵。我警告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导致新一轮泡沫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产托市政策实行还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种政策打压房地产市场；宏观刺激政策刚刚实行一年，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我还认为，体制的倒退将损害中国的

长期增长，只有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 \* \*

我将这本访谈录定名为“什么改变中国”，既是想解释过去，也是想激发人们思考未来。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一文以来，我一直认为，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人们通常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会阻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他认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国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生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钱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34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改革要成功推进，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理念，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理念，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

而行事。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观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观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观念变了，不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体可以说是引导大众和普及新观念的强大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最近几年我一直愿意与媒体人士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才有了这本书的内容与读者分享。

我必须向读者坦承，在 2008 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始的 20 年，也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本书传递的是我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张维迎

2012 年 4 月 30 日

自序 V

理念决定未来

开篇 1

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 / 3

第 I 篇 奇迹真相 27

中国改革一路如何走过来？经济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什么改变中国——企业家成长和地方政府竞争 / 29

突破经济体制“拦路虎”——回望改革 30 年（上） / 45

国有制下的不可能——回望改革 30 年（下） / 61

白道道画出真斑马——中国改革的两条主线 / 83

为市场申辩——再谈“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 93

## 第II篇 企业进化 107

为什么必须搞产权改革？市场经济中企业如何生存？

保姆何以糟蹋主人的家——国企改革的真问题 / 109

先富起来的“弱势群体”——中国企业家生态 / 125

灾难后的反思——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 141

偷不走的竞争力——谈企业品牌、创新与体制 / 153

商业道德靠什么——市场中的信誉机制 / 167

## 第III篇 重启改革 183

经济危机症结何处？如何突破改革停滞困境？

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变化——危机时刻的中国改革 / 185

按下葫芦起了瓢——政府不应干预市场调整 / 191

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凯恩斯主义的代价 / 203

让市场自身走出危机——应对危机的最佳方法 / 219

面对无知与无耻——再造改革理念和动力 / 233

## 尾 声 245

### 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 致 谢 257



开篇  
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



## 从强盗逻辑到市场逻辑<sup>①</sup>

主导人类历史的就两种逻辑：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之前，强盗逻辑一直占主导；只是过去两百年以来，市场逻辑才占主导。

在市场的逻辑中，个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为他人带来幸福。这是市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和社会繁荣的原因。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在企业、个人的交往中建立一系列信任和交易机制。

中国 30 多年来的改革是从强盗逻辑转向市场逻辑、从职权经济转向产权经济的过程。它把互相伤害的竞争变为互相创造价值的竞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有巨大潜力，要靠减少政府权力和国有经济范围、发挥企业家精神来实现。

**访谈人：**您在 2010 年出了一本书叫《市场的逻辑》，带有一点启蒙性质，里边对中国 30 多年以来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能否介绍一下您的主要观点？

<sup>①</sup> 来源：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访谈人：王鲁湘；访谈时间：2011 年 7 月。



**张维迎：**我们中国只是在过去 30 年里边真正开始实行市场化的改革，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在世界上被称为一个奇迹。所以我想，要认识人类的历史，认识中国的变革，包括未来中国究竟潜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真正地理解市场，理解市场是怎么运作的。

要理解市场的本质，首先要理解人的本性。关于人的本性，我们知道学术界自古以来都有好多的争论，就像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性善性恶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学者、哲学家、宗教创立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就是人类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点我想不同的学派之间并没有大的争议。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追求更好的生活？特别是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出于自身的利益，怎样才能最好地改进自己的生活？从整个人类历史上来看，追求幸福的方式我们可以划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大街上看到的抢啊、偷啊，把别人的东西拿到自己手里，让别人不能享受，自己可以享受，这个我叫它强盗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创造财富，然后自己获得收入，过更好的生活，这个我叫它市场的逻辑。

人类的历史大致来讲就是在这两种逻辑不断作用下演进的，有时候这种逻辑占主导一点，有时候那种逻辑占主导一点。我们举一个最近的历史，比如说日本、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的是什么逻辑？强盗的逻辑。就是他希望通过武力、战争的方式，把别的国家的财富掠夺来，服务于本国的利益，本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失败了。二战之后他们又崛起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靠什么？靠市场的逻辑，也就是说他们生产出其他国家人民喜欢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世界上大的经济体，如日本长